

中国百年报业掌故

刘小清 刘晓滇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百年报业掌故 刘小清, 刘晓滇编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陈子昂 苑—圆源—圆近—猿

I 中援援Ⅱ 援①刘援援②刘援援Ⅲ 报刊 原文化史 原史料 原中国 原现代 IV 援圆怨援苑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缘园园号

书 名	中国百年报业掌故
编 著 者	刘小清 刘晓滇
责任编辑	马洪才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员缘号
邮政编码	圆园园圆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五四印刷厂
开 本	愿园伊员愿毫米 员圆
印 张	员圆 插页 圆
印 数	员—源缘册
字 数	圆园千字
版 次	圆园年元月第 员版第 员次印刷
标准书号	陈子昂 苑—圆源—圆近—猿 源缘
定 价	(软精装) 员圆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名人与报

严复创办《国闻报》.....	员
章太炎入台湾报馆前后	源
苏曼殊与《国民日报》.....	远
陈独秀与《安徽俗话报》.....	怨
蔡元培与《俄事警闻》、《警钟日报》.....	员
胡汉民主编《民报》	源
秋瑾创办《中国女报》	苑
胡适与《竞业旬报》	怨
戴季陶考入《天铎报》经过	员
李大钊主持《晨钟报》、《晨报·自由论坛》	源
周恩来与《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苑
蔡和森与《向导》周报	苑
谢觉哉与《湖南通俗报》	猿
邓子恢与《岩声》报	猿
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	猿
邓小平主编《红星报》	源
毛泽东与延安《解放日报》	源
傅作义与《平明日报》	苑

报人春秋

梁启超主笔《时务报》	缘
福开森与《新闻报》	缘
《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	缘
章太炎抗争封禁《民报》	缘
陈少白与革命党人机关报	远
郑逸梅与他的“补白”	远
成舍我与他的三个“世界”	缘
张友鸾骂进《世界日报》	远
孙伏园怒辞《晨报附刊》主编	苑
戈公振与《中国报学史》	苑
报界闻人张竹平	缘
邹韬奋贫民窟办报	苑
萨空了香港恢复《立报》	愿
《新民报》“三张”	愿
乔冠华与《时事晚报》	愿
戴望舒与《星座》	愿
梁漱溟创办香港《光明报》	愿
徐铸成与香港《文汇报》	苑
王芸生与香港《大公报》起义	愿

报业史话

《循环日报》——华人创办的第一份报纸	愿
从《万国公报》到《中外纪闻》	愿
《知新报》言《时务报》所不敢言	苑
首开先河的《女学报》	苑

《大公报》的馆房转主	猿缘
《时报》的时评	猿苑
孙中山褒扬的《民立报》	猿怨
五四运动时的《民国日报》	猿園
有悖革命的《革命周报》	猿範
鱼目混珠的《中报》	猿怨
人民喉舌《华商报》	猿園
从《扫荡报》到《和平日报》	猿源
昙花一现的红卫兵报	猿苑

报坛杂记

《有所谓报》反清立场旗帜鲜明	猿猿
《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	猿猿
秋瑾就义与沪报之反响	猿缘
南社社友与《太平洋报》	猿愿
《时事新报》征求黑幕秘闻	猿猿
上海报纸与模特儿风波	猿園
《晨报附刊》的爱情大讨论	猿缘
《世界晚报》因祸得福	猿愿
反对报界托拉斯风潮	猿園
《世界晚报》长篇连载创纪录	猿猿
报人吴观鑫受辱杜公馆	猿远
《明星日报》评选电影皇后	猿愿
首开先河的报纸评文艺奖	猿園
《大公报》一文激众怒	猿園
国共合办《救亡日报》的谈判	猿源
《新华日报》参与《联合版》交涉经过	猿苑

重庆戏剧界为《救亡日报》募捐演出	袁愿
《大公报》资助萧乾赴欧洲	袁愿
《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	袁愿
《解放日报》与皇甫平系列社评	袁范

报案摘录

中国报史上第一起名誉纠纷	袁园
康有为之女诉《中国日报》案	袁园
轰动一时的《苏报》案真相	袁缘
袁世凯禁邮禁阅《大公报》	袁愿
轰动一时的《民呼日报》案	袁园
《民吁日报》遭查封经过	袁缘
《大江报》案始末	袁缘
报人黄世仲、陈听香遇害经过	袁远
邵飘萍以身殉报	袁积
因文字贾祸的林白水	袁员
《新闻报》一字惹祸	袁猿
《江声日报》事件与记者节	袁缘
罗隆基天津遇刺	袁愿
扑朔迷离的天津两报人被杀案	袁园
上海报馆遭袭与朱惺公血案	袁园
严怪愚与《力报》案始末	袁原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害经过	袁范
《毛牛》副刊祸起萧墙	袁园
蒋介石封禁《新民报》	袁园

报史秘闻

张之洞翻脸与《强学报》厄运	圆苑
光绪帝密诏康有为出京办报	圆园
孙中山、章太炎因《民报》引发争端	圆圆
史量才盘进《申报》财源	圆缘
《神州日报》与“国文函授学社”骗局	圆愿
《民国日报》与南社之争	圆园
《晶报》连载《辛丙秘苑》的三角谈判	圆猿
《新黎里》报遭诬与抗诬	圆缘
《新闻报》首发蒋宋订婚经过	圆愿
《新新新闻》出笼的台前台后	圆园
《申报·自由谈》“腰斩张资平”风波	圆圆
《大美晚报》披露“勾命单”	圆缘
毛泽东等《紧急声明》缓登经过	圆愿
臭名昭著的《艳电》披露经过	圆园
轰动全国的反汉奸宣言发表经过	圆圆
《大公报》披露日汪密约	圆缘
《文汇报》刊发李公朴事件秘闻	圆苑
冈村宁次、麦克阿瑟抗议《改造日报》	圆怨
《燕京新闻》追踪报道沈崇事件	圆圆
《中央日报》刊登《资本论》广告风波	圆缘
《申报》一则特大新闻的幕后	圆愿
七人退出《星岛日报》的公开声明	圆员
《光明日报》关于“合二而一”学术讨论内幕	圆源
《文汇报》发表批判姚文元文章及其幕后	圆愿

《解放日报》的“政治错误”与恽逸群的厄运	猿园
陈伯达在《人民日报》“搞政变”	猿缘
《人民日报》与张浩事件	猿愿
后记	猿圆

名人与报

严复创办《国闻报》

以译述赫胥利《天演论》而在中国思想界名声显赫的严复，是近代中国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他以进化论为理论武器，唤醒人们“自强保种”，挽救民族危亡。他以天赋人权论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广泛宣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此，严复创办了《国闻报》，宣传变法图强，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

严复是晚清时代的激进派，“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可以代表严复维新思想的核心内容。严复以坚实的西学为基础，其造诣之深，学识之广，是当时维新派人物所难以比拟的。严复对报纸在近代中国传播新思想的作用十分看中，早在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创刊时，他即非常关注，除捐赠银票外，还为《时务报》撰写了大量极富时代气息的文章。为进一步畅抒胸臆，严复遂决定自己创办报纸。这份报纸便是 1897 年在天津紫竹林租界问世的《国闻报》。

当时与严复一起创办《国闻报》的有原翰林院编修、后官至直隶候补道、北洋大学堂总办的王修植，原礼部主事夏曾佑以及

被授予内阁中书的杭辛斋。严复在《国闻报 缘起》中将创办该报的宗旨归结为两点 :即通上下之情、中外之情。严复创办《国闻报》时 ,正值维新运动勃兴而起 ,新学炽盛 ,报刊林立。其时除《时务报》外 ,尚有《知新报》、《集成报》、《求是报》、《经世报》等 ,虽然众报“体例各殊 ,宗旨互异 ,其于求通之道则一也”。而严复认为“求通”除在国内“通下情”外 ,让国人了解世界即“通外情”尤为重要。故他称 :“欲通知外情 ,不能不详述外事 ,欲详述外事 ,不能不广译各国之报。此《国闻报》馆之所以继诸家而起也。”

严复以《国闻报》为阵地 ,发表了大量时评文章 ,开启民智 ,激发国人的救国热情。据考证 ,其时严复的主要文章有《驳英泰晤士报 论德据胶澳事》、《论俄人为中国代保旅顺大连湾事》、《中俄交谊论》、《拟上皇帝书》、《论中国教化之退》、《论中国阻力与离心力》、《说难》、《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在通艺学堂演说西学门径功用》以及《论译才之难》、《弭战议》等 ,所有这些无不体现其强烈的爱国色彩以及变法求通的欲望。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称誉《国闻报》“乃北方报纸之最佳者” ,实非虚言。

《国闻报》其时仿英《泰晤士报》之例 ,在日报之后继以旬报。旬报称为《国闻汇编》 ,其内容以重要消息及论说、译文为主 ,尤其详于外国的事情 ,重点刊载国内外有保存价值的文章。《国闻汇编》最大贡献在于连载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天演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 ,以“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简捷语言 ,向国人敲响了祖国危亡的警钟。《天演论》风行一时 ,不胫而走 ,广为流传。严复的名字与历史地位也因此扶摇直上 ,留芳千古。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它启蒙了一代又一代人。

1897年,严复的得意门生熊元锷从《国闻报》因多篇论说、翻译文章中精选了猿篇,编辑成《国闻报汇编》两册,其中以严复文字为主。当时西方人士对《国闻报》评价甚高,认为它“名列中国报界第一”,超过了《时务报》。

严复经营《国闻报》在当时非常艰难。如实记载官场腐败势必涉及当权派,议论是非一定要触怒违法乱纪的达官贵人,译文介绍西方国家政俗言行也要引起守旧势力的非议。因此,严复在《国闻报》上坚持正义,主张维新,呼唤救国,宣传西学,每前进一步都须有巨大的勇气。《国闻报》出刊不久,即受到官方的密切注视。为防不测,严复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性措施。报馆设在租界,受外国领事的庇护,使清廷难以干涉即为远见之一。其次,创办人严复、夏曾佑、王修植和杭辛斋均不公开出面,而推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福建人李志成为报馆馆主。凡严复等创办人写的文章均不署名。严复平时足迹未履馆门,凡有关报纸事务均在王修植家中聚会相商。另为防清政府干涉,报纸从1898年即假盘给日本人西村,以西村挂名经理作掩护。

然而由于《国闻报》言辞激烈,目标太大,终于有地方官员上书朝廷,要求查禁《国闻报》。朝廷随即令直属总督王文韶查处。王文韶此后向朝廷奏报称:“窃见近来报馆林立,指摘时政,放言罔忌,措词多失体要。《国闻报》所登严复言论,亦时蹈此失。盖该道曩年游历泰西,熟谙洋务,扭其书生之见,欲以危言耸论,惊动当世,以翼力振时局,其心尚属无他。今该道被参报馆合股,及与外人勾串各节,既查无其事,应仰恳天恩,免其置议。臣仍谕饬严复并学堂学生等,嗣后不得再有只字附登馆报。”此前严复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道员,王文韶此奏折是有意为严复开脱,一为官官相护,二怕有失察之罪。严复虽幸免不测,然却十分感慨。他专撰《说难》一文,论述办报之难,并称中国自设报馆已有

猿年,以往报刊论事,往往似是而非,若有若无,原因在于“人世间之情伪相攻,爱恶相取,崎岖险阻,不可方轨而驰也”。但他自己不以为然,郑重宣示:“就吾见闻,敬告天下,平心以出之,正志以待之,如此而已矣。”

戊戌政变后,随着维新运动被扼杀,国内形势险恶,严复遂正式将《国闻报》售给日本人,不久离开天津避居上海租界。

章太炎入台湾报馆前后

愿年 愿月 源日,京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突然发动政变,囚禁了倡导变法的光绪皇帝,废除新政,捕杀“六君子”,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太后余怒未息,发出谕旨,在全国缉拿维新派人士。

此前在上海加入强学会并积极参予维新活动的章太炎也因此被列通缉名单。虽然身临危境,章太炎却处变不惊。他仍在《昌言报》上发表《书汉以来革政之狱》的文章,纵观戊戌之变,阐述变法败因,深刻透彻,创研究戊戌运动之先河。

章太炎在上海原拟等“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遗体运到上海后设奠相祭,但清政府缉拿甚急,风声日紧,其友人催促其尽快离沪。章太炎乃决定放弃原计划,赴当时被日本人占领的台湾,以避一时之祸。

章太炎于 愿年 愿月 源日到达台北,因日本诗人山根虎雄的介绍到《台湾日日新报》任记者。《台湾日日新报》是当时台湾最大的一份报纸,为台湾总督倪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创办,每天出六版,四版日文,两版中文,社长名守屋善兵卫。章太炎入报馆后,该报即登出启事:“此次本社新添聘浙江文士章炳麟,号枚叔,经于昨日从上海买棹安抵台湾,现已入社整顿

寓庐矣。”章太炎时住报馆附近，却以在家撰稿为主，不常入报馆。

在《台湾日日新报》，章太炎发表了大量诗文，流露出忧国忧民以及寻求救国真理的苦闷。另外亦撰写了众多文章，字里行间表现出对沦为殖民地的台湾人民的同情。他称台湾为“闽南之大屿”，“天下称其膏腴”。他很关注台湾人民的生活，通过文章提出改善台湾民生的一系列办法，如开凿池沼，讲求农事，养淡水鱼以及发展文化，设立藏书楼等。对台湾同胞的骨肉之情洋溢其间。章太炎在《台湾日日新报》还发表大量政论文章，表露了强烈的反满情绪。《书清慈禧太后事》则为其代表作，文中列举了西太后的种种罪行，从祺祥政变“肃顺之诛”到戊戌政变六君子“伏尸市曹”，谴责了西太后的暴政与反动。文章对出卖维新志士的两面派人物袁世凯之流亦有辛辣讽刺和斥贬。章太炎同时在文章中称“其志则以访延平郑氏之遗迹也”，表示要考察明永历年间封为延平郡王的郑成功在台湾抗清的事迹，与清政府“不共戴天，不共履后土”。

章太炎在台湾专门给康有为写了一封信，对流亡中的维新派首领表示了慰问，鼓励他继续坚持维新变法这“旋转乾坤”的事业。康有为在变法失败逃往海外的困境中收到章太炎的书信，非常感动。他随即复函章太炎称：“……神州陆沉，尧台幽囚，惟冀多得志士相与扶之。横睇豪杰，非足下谁与？惟望激昂同志，救此沦胥！”章太炎随即将此信在《台湾日日新报》上刊登，并在报端解释与康有为在学术上的分歧以及在古文经学上的论争，但并不妨碍这时他们政治观点上的相近。

这时的章太炎仍在苦苦探索着改造中国的道路，提出了《客帝论》与《分镇论》的设想。这两篇政论文均发表于《台湾日日新报》。前文的宗旨是强调缓和满汉民族矛盾，恢复汉族政权。他

主张身为“客帝”的清朝皇帝应自动退位，避免被驱逐下台。章太炎的这种主张事实上是行不通的。这只能反映此时的他仍在改良主义的思路中徘徊。而后文则提出加强汉族地方官员权势的改良设想，表现了他崇重方镇，对地方督抚抱有救国幻想的心态。

章太炎身为日本人所办报纸的撰稿人，却又常常发表一些抨击日本政府统治人民的文章。起初他的言论还不十分激烈，故未引起当局重视。到后来，简直有些“恣意攻击”了。仿佛他此时并非身在台湾，并非在日人报馆供职。其某文章中竟有“台湾总督府官僚，大多擅作威福，压制台人”等语。台湾总督因此严厉训斥了报社社长。守屋善兵卫社长悻悻回到报馆，派人去叫章太炎。章太炎写张字条托来人带给社长，字条上写道：“何不唤守屋来？他不知土前为慕土，王前为趋土者乎？”守屋社长见之气得七窍生烟。他忍无可忍，亲赴太炎住处，大声斥责章太炎“傲慢无理”、“不解事理”。他遂下逐客令说：“如你不愿在本报操觚，就辞职归去吧。”等守屋社长走后，章太炎自言自语道：“名善兵卫，竟是恶兵卫。礼貌衰，则去之，何用逐？”

这时，梁启超在日本主办《清议报》，章太炎故交钱恂又新任中国留日学生总监，许多维新志士皆聚集日本。而章太炎在台湾却颇感闭塞与寂寞，于是他接受了梁启超和钱恂的邀请，于1903年远月前往日本，从此脱离《台湾日日新报》。

苏曼殊与《国民日报》

苏曼殊是清末民初中国文坛的奇才，他集作家、画家、翻译家于一身，以《断鸿零雁记》为代表作的系列言情小说使他赢得万千读者的仰慕。苏曼殊早年在日本留学时结识了章太炎、孙

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受他们影响而弄潮于革命激流。以后苏曼殊参加了旨在推翻清政府的青年会和留日学生义勇队。1906年,苏曼殊由日本回国,行前作七律诗一首赠予他的老师。诗云:“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轮明月白如霜。”其为推翻清朝政府而义无反顾的决心以及准备在浩茫的烟水中去寻找自己归宿的志向跃然于字里行间。

当时上海曾有章士钊主编的《苏报》,因具有明显的革命倾向而遭清政府查封。章士钊并未因此妥协,他联合陈独秀、张继等又在上海创办了《国民日报》,继续鼓吹革命。正是《国民日报》吸引了回国的苏曼殊。这张在上海英租界内出版的报纸,是当时革命派的主要喉舌,加之陈独秀、张继又都是苏曼殊在日本青年会的故交。于是,回国后的苏曼殊便风尘仆仆直奔上海报社而来,欲与他们一起为革命呐喊。

苏曼殊是这年10月初抵达报社的,为报社助理编辑和翻译,同时又撰写稿件。在《国民日报》工作期间,是苏曼殊纵横文笔进行革命宣传最热情洋溢的时期。他燃烧着旺盛的战斗热情,十多天就撰写了歌颂俄国虚无党党员郭耳缙的《女杰郭耳缙》和《呜呼广东人》两篇语调急切的革命文字。苏曼殊过去长期目睹中国和日本的现实生活,在胸中积聚、压抑着那么多痛苦而深沉的感情,久久得不到发泄。现在他终于可以借助报端倾诉胸臆,于是滔滔文思喷涌而出。他不无激愤地写道:“我今有一言正告我广东人曰:‘中国不亡则已,一亡必先我广东,我广东不亡则已,一亡必亡在这班入归化籍的贱人手里……’各国以商而亡人国,我国以商而先亡己国。”苏曼殊认为对付清政府的最好办法就是暗杀。当时不少革命党人醉心于操利刀,挟炸弹,五

步之内血肉横飞的恐怖活动 ,以慷慨悲歌的姿态 ,演出一幕幕诛民贼、惩凶顽的壮烈悲剧。苏曼殊受其感染 ,因而推出《女杰郭耳纒》一文 ,从郭耳纒身上寄托他暴力推翻满清的壮志。

在《国民日报》期间 ,苏曼殊以《惨社会》为名翻译发表了雨果的著名小说《悲惨世界》。这是他一生中翻译的重要作品之一。《惨社会》是我国首次翻译的雨果作品 ,在《国民日报》连载后 ,反响很大。次年 ,即有镜今书局出版单行本。

《国民日报》旗帜鲜明 ,言论激烈 ,其排满革命的宗旨与《苏报》相同 ,“而规模尤大”。《国民日报》摒弃清光绪年号 ,改用黄帝纪元的纪年办法 ,可谓大胆举措。其言论多为揭露清政府腐败昏庸 ,为此引起清廷极大恐慌。清廷惊呼 :在《苏报》被禁后 ,“《国民日报》依然妄肆蜚语 ,昌言无忌 ,实属执迷不悟 ,可恨已极” ,并严令沿江各省不准商民买看该报 ,严禁邮政局代寄该报 ,以“杜其销路 ,绝其来源”。然而清廷此举适得其反 ,《国民日报》因此更加闻名 ,以至“发行未久 ,风行一时 ,时人咸称《苏报》第二”。

正是在这样的报社 ,苏曼殊热情高涨 ,心情愉快。此前 ,苏曼殊因特殊的家庭出身背景以及感情受挫而于十几岁剃度出家 ,后虽还俗 ,但性格却孤僻怪异 ,时常表现出沉默寡言与心灰意懒。而在《国民日报》期间 ,他则表现出少有的快乐情绪。当时苏曼殊与陈独秀、章士钊、何梅士同住一室。他们思想观点一致 ,相处亲热 ,彼此相见恨晚 ,一见如故。陈独秀长曼殊五岁 ,幼年生活与家庭环境在某些方面与苏曼殊相似 ,他的作风、为人、学问处处给苏曼殊以影响。两人在这里共事后 ,奠定了终身不渝的友好感情。苏曼殊同章士钊也很友好 ,章士钊曾有赠苏曼殊诗云“尔我相逢未剃时 ,也将红叶互题诗”。

正当苏曼殊为获得这样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而深感惬意 ,

并准备在此大显身手的时候,却不料报社的编辑部与经理部因工作权限问题闹起了矛盾,最终不可调和而引起诉讼。报社因此内讧一蹶不振,《国民日报》这张在读者中备受青睐的报纸被迫停刊。怀着一腔热血回国的曼殊对此大为失望。此后他悄然离开上海赴香港,抵陈少白主办的革命党人海外喉舌《中国日报》社,去追求另一个新的天地。

陈独秀与《安徽俗话报》

1905年,因上海《国民日报》停刊,原参与办报的陈独秀便离开上海回到故乡安徽安庆。当时由吴挚甫先生创办的桐城学堂成为陈独秀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与该校学长房秩五、吴守一纵谈时事,嬉笑怒骂。此时,陈独秀深切感受到“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陈独秀面对晚清黑暗,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的社会现实,觉得有起而救之的责任,故此前两度计划创办《爱国新报》,后因清政府压迫不得不放弃而远走他乡。如今“卷土重来”,他决计要实现梦萦已久的计划。于是,《安徽俗话报》便诞生了。陈独秀约房秩五、吴守一共同创办,并分工房负责教育,吴负责小说,其余均由陈独秀自任之。

《安徽俗话报》创刊于1905年猿月猿日,其经费大部分为安徽地方爱国志士捐助。陈独秀称他办《安徽俗话报》有两个主义:“第一是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免得大家蒙在鼓里,外边事体一点都不知道。”“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说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他认为,“这两种主义,想来大家都是喜欢的”。陈独秀正是考虑到报纸服务对象的广泛性,故而用“俗话”